

中國歷史研究社編  
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

信及錄

鴉片事略

清林則徐

清李圭

神州國光社

主編者

程演生  
李季  
王獨清

編輯者 中國歷史研究社

本書輯錄 林孟王

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

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 
神州國光社  
三八四弄四號

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出版  
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三版

實價

在今日，鴉片問題是幾人盡知的事件，關於這個問題的記載，也時常散見于近代著述裏面。但若求比較有系統的專著，或已刊的確實文獻，則不多觀。本叢書第二十八冊輯錄下列兩種的史料，以供這個問題的研究：

一·信及錄

二·鴉片事略

鴉片事略的著者爲清江甯人李圭，書成於光緒中葉，有北平圖書館民國二十年印行本。這部書的用意，恰如著者自己所說，欲使國人明瞭英人以售賣鴉片起釁及其後勸禁鴉片的始末。書分上下兩卷，上卷特詳於前清嘉慶道光間禁煙的經過，下卷說明鴉片戰爭後的弛禁情狀。牠對於道光迄光緒前後五十年間鴉片問題的嬗變，確有着忠實的記述。

信及錄爲林文忠公則徐以欽差大臣查辦廣東海口事件——卽主持斷絕鴉片根株的事件——所發布的文告及與外人往來的文件，自道光戊戌年十一月起至庚子年三月止，舉凡林文忠公政書所未列入的禁煙政績，都彙集於此。是書原爲林公所遺留的抄本民國十八年適值虎門燒煙九十年紀念，曾一度刊行問世，但刊印不多，流傳未廣。書中外人所遞呈稟，幾乎全是當時不通過的外國人的漢文，格外流露出當時的真相，而成爲鴉片事件之最珍貴的文獻。

## 二

鴉片爲使中國幾淪於亡國滅種的最大因素，遠非洪水猛獸的禍害所可比擬，這已是一般所洞見的事實，可勿庸贅言了。在這個問題上，我們必需特別與以注意的，則因爲這個毒物會爲外禍的導火線，同時又映出百年來中國政府之舉朝關茸的黑暗狀態。所以，檢討舉世所重視的鴉片事件，探究牠的底蘊，格外切合於我們窮溯中國內亂外禍的本旨。

在這個鴉片事件裏面，有外族之經濟的武力的侵略——尤其是帝國主義之殺人不見血的酷毒手段的侵略，有前倨後恭只怕強禦的政府，有禍內媚外委曲求全的官吏，有爲

序  
虎作倭惟利是視的漢奸，但同時也有犧牲一己澈底負責的忠烈和迫于義憤力悍外寇的  
義民：種種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可恨可痛可歌可泣的事實，同時在這一幕民族悲劇裏  
充分表現出來。

可是，因為鴉片事件的結束，打通了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的門戶，陷整個中華民族于搖  
手轉足不得的地步，就有一部份人對於當時主持嚴厲禁煙的人物，加以「持之過激」  
「輕啓邊釁」的批評。這與當時道光諭旨所說「不但終無實濟，反生出許多波瀾」（東  
華錄道光四十二）的話，恰相吻合。在道光是有心搪塞，原不足論，而這種不明歷史背景的  
淺識，也就是代表不抵抗精神的一種謬見。其實，九十年前的林公，已曾對此下了透切而沉  
痛的駁斥，那裏面最精警的論據是下述這幾段話：

……鴉片之爲害甚於洪水猛獸，卽堯舜在今日亦不能不爲驅除。望人執法懲奸，  
實爲天下萬世計，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以鴉片爲不必禁之理。若謂夷兵之來係由  
禁煙而起，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者，早已包存禍心，發之於此時與發之于異日，其輕重  
當必有辨矣。臣愚以爲鴉片之流毒于內地，猶癰疽之流毒于人心也。癰疽生則以漸以  
成膿，鴉片來則以漸以致寇，原屬意計中事……而逆夷滋擾浙洋，卽與潰膿無異。然惟

膿潰而後疾去，果如其法醫治，托裏扶元，待至膿盡之時，自然結痂收口；若因腫痛而別籌消散，萬一毒邪內伏，誠恐患在養癰矣……英逆不遵法度，且肆鴟張，是以特奉諭旨斷其貿易，然未有浙洋之事，尚可仰懇恩施……今非維難許通商，自當以威服叛。第恐議者以爲內地船礮非外人之敵，與其曠日持久，何如設法羈縻。抑知夷性無厭，得一步又進一步，若使威不能克，卽恐患無已時，且他國效尤，更不可不慮……〔林文忠公政書密陳夷務不可歇手片〕

林公的意見可綜括如下：鴉片是絕對不可不禁的；禁鴉片就與英人的利益衝突，結果不得不致寇；英人早已包存禍心，爲禍無窮，祇有及早抵抗，才能壓阻外禍之潛入；既啓戎端，祇有澈底抵抗，才可免外族得步進步的侵凌。照這個意見簡單的說，就是整個問題關係着十九世紀上半期中國與國際的問題，換言之，卽關係着帝國主義開始侵略中國的問題，而絕不是單純的一個禁煙問題。所以，要探討鴉片問題的底蘊，就先要明白這個關係；要估量林公的意見是否正確，及其對英交涉的策略是否適當，就先要說明這個關係的真相。

在另一方面，我們也常聽到若干自命爲立場公允的評判。有的說：英國當時對於中國所抱的願望，只限於通商，却未存心以武力威服中國；鴉片戰爭，在中國固是突如其來，在英

序  
國亦何嘗不是出於意外的變故。這個觀察的當然結論，無非是說，設使當時政府能夠滿足外人的通商要求，就不至產生了這次鴉片戰爭的慘痛結局。

除非是抹殺了歷史上的事實，誰也不能接受這個淺陋的意見。在鴉片事件未發生之前，英人已因對華通商而獲得鉅大利益；即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後，中國政府所要斷絕的是鴉片貿易，而不是通常的貿易，後來是因爲英國反對禁煙政策而影響了牠的通常貿易的利益。（參閱信及錄文件。）英國之使用武力，當然與斷絕鴉片貿易的問題直接有關。要明瞭其中的關係，一方面應看清鴉片與英國的關係，另一面應認識歷來英國對華之口蜜腹劍的策略，或進一步說，以武力爲後盾的侵略政策。

又有人說，鴉片戰爭的結果，中國固然大受損害，但因東西溝通從此可以自由，不無使中國蒙受無限的利益。可是，飽受九十餘年來帝國主義侵略的慘痛的中華民族，除喪心病狂的外，誰欲領略帝國主義侵略自由出入於中國門戶的厚賜呢！

### 三

5  
在未講到英國對於鴉片貿易的態度前，我們應一述鴉片戰爭前中英關係的梗概，以

求明瞭這次戰爭的遠因。

十九世紀是歐洲帝國主義逐步發展的時期，殖民地的追求，和以產業落後的民族爲被掠奪的市場的企圖，是愈演愈烈。尤其是那時產業最發達的英國，格外利用自己的武力去掠奪他人的利益，而實現其領土的或經濟的傳統侵略主義。自十七世紀創立東印度公司以來，英國是着着進展，實際上全印已入英人掌握，再囊括而東，乘機伺隙，力圖染指中國，這種經濟侵略的野心，是已昭然若揭了。在清之初葉，牠就力求中國給與通商的便利，自嘉慶以後，則急轉直下，由過去之漸進態度一變而爲激進態度。在英國，是非達到通商的目的不可，圖窮匕現，最後訴之武力，這就是帝國主義侵略所必經的程序。鴉片事件，在一方面，可說是中國應付這個積極經濟侵略的機會，在另一方面，不但是英國勢所必爭，而且是掃除侵略障礙所必然促成的結果。其中顛末是我中華民族絕對不可不清的。作者不憚辭費，特逐節與以說明。至於英人之以鴉片貿易違犯中國法律與人類道德，實已昭彰顯著，英人亦早自承認不諱，勿須多加批評了。

〔一〕英國在華通商之障礙

從馬加特尼 *Macartney* 之卑辭厚幣以求舟山、寧波、天津諸港的自由通商，以迄納



披爾 Napiers 之用軍艦強航虎門以脅制廣東官吏，英人之咄咄逼人的侵略嘗試，是已與中國以嚴重的警告了。自命爲奉行『天朝體制』的清廷，對此顯而易見的陰謀，歷來除嚴辭予以駁斥外，復嚴定廣東爲唯一外國通商的口岸，並隨時加緊地方政府之就地施行約束的辦法。其著者首推外國商館（即信及錄所稱爲夷館）與公行（即信及錄所稱爲洋商）的制度。

按照當時定制，外商不得長年居住廣東。通商時期一過，他們即應歸國，或移住澳門。其因料理貿易事件而留省者，必需居住于官廳所指定的十三家商館裏。照外商寄居商館的規程，他們須受公行員的指揮，其購買貨物，無一不經公行員的手。他們不得自由買賣，不得自行買賣，也不得自定價格。即欲雇用司帳員，驗定金質者，傭僕，廚役，擔水夫，及船夫等，亦不得自由選擇，他們不得在省城隨意出入，爲的是防其與當地奸商交易，及經營其它秘密買賣的情事。他們的各種請願書，不得自行進稟當地官吏，而必需由公行經手。（參閱 H. B.

Morse: *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* 和稻葉君山清代全史）

以這種種嚴格的限制而言，當時政府所以預防外人分外侵略的紙上設施，不能不說是很周到的。在外商方面——尤其是英商，雖然以賄賂貪官污吏與勾結漢奸的手段，來破

壞『天朝』的藩籬，博取鉅大的利益，但那種種動見掣肘的不便形式，既成爲他們暢所欲爲的障礙，而中國官吏之強侵豪奪，與公行員之從中尅扣，尤使之增重負擔而減少盈利；他們貿易愈發達，則擺脫羈勒之心必然也愈迫切。固然嚴禁鴉片的直接結果，是格外打擊了英人的利益，引起他們的極端行動，但在上述那種通商情形下，英人必不耐長久忍受。所以就無鴉片事件，英人終要放棄過去的柔順政策，而採取非常的強硬手段。關鍵所在，就是中國政府既立意不變更『天朝體制』，則應始終具有維護這個體制的實際『天威』，而鴉片問題之能否圓滿解決，也就全看這個『天威』的實際表現如何。

## （二）鴉片與英國

就英國鴉片貿易上看，上面論斷可得到更確實的證據。

在這個時期中，有一個很顯明的事實，即英國一面積極經營印度，另一面則藉經濟手段侵略中國，以增厚其對印度的支配權。在這個三角式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之下，打開中國的門戶，便成爲英國殖民發展的迫切需要。因爲在那時候，中國是歐洲人心目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，祇要有孔可鑽，無不博取厚利。試以鴉片戰爭前通商備受中國限制的時期來說，英國在中國的商業發展，已經是一日千里。一七五一年（乾隆十七年），英國駛

就已多負債於外商，債額竟達至三百八十萬一千零七十七先令之鉅。有的歷史家認為這是外國資本流入廣東的現象，特別是在廣東的高利息誘致之下，無限制的金錢，就由印度搬運而來，貸與廣東商人（見稻葉君山清代全史但壽譯本第三冊九十一頁）核以中國每歲漏銀如是之多，與英國因賣出鴉片而吸收現銀如是之鉅，根本上無須向印度搬運現金；而且照上段的分析，印度所輸出的是特產，而迫切需要的是現金，更不能發生自己資金流入中國的現象。那無非是鴉片貿易的鉅量盈利的一部份，或因有留放當地以供週轉的關係，而順便辦理金融的業務，兼以博取正常貿易外的高利。這只可視為基於鴉片貿易發展而產生的現象。再以當時廣東的利率講，普通月息五分，短期放出的二分或三分，而用價值不變的物品担保的，也不下一月一分，英人經濟侵略的收獲之鉅，是不難想像了。

以上是就鴉片貿易上的利益言之，而英帝國主義之得力于鴉片的地方，尙不止此。即英國經營印度的財政，也一大部份取資于鴉片的稅收。下述一段，可資證明：

「英人初有印度，歲徵其（鴉片）稅。後見流入中國，吸食漸衆，銷路日暢，於是印度人之操重業者，莫不爭種。印酋，英官見獲利之鉅也，咸命官經理其事，不許民間私種。英於孟買，加爾格達（加爾各答）兩海口設官權稅，箱納英金六十鎊。」（鴉片事略卷

上。

到鴉片戰爭結束後，英人雖然頂着不名譽勝利的醜名，而對於鴉片貿易始終不肯絲毫放鬆。到光緒初年，英人每年運到香港的鴉片，皆在十萬餘箱；即以中國每年進口有稅的數量而論，也增至七萬餘箱。（參閱鴉片事略卷下所錄左宗棠奏請加重洋藥釐金摺。）印度財政之取資於鴉片者，自然日見鉅大。在同治十三年（一八七四年），英國報載，印度每年收稅共五千萬鎊，內鴉片稅達八百萬鎊。（鴉片事略卷下。）鴉片事略又說：

「光緒元年（一八七五年）五月，〔英國勸禁鴉片人士〕復稟請議院設法漸令印度減植鴉片，議院以四端批覆，謂：鴉片爲東方人性情所好，日所必需，一也；華人自甘吸食，於英何尤，二也；衆士所陳鴉片爲害情形，過當難信，三也；罌粟關印度度支，欲禁必倍徵他項，恐激而生變，四也。觀其末端，可知英人意向矣。」

又說：「七年（一八八一年）四月初二日，英議院諸臣會議，有大臣丕斯者，亦曾〔勸禁鴉片會〕中人也，出會中所遞請禁鴉片稟詞多至二百通，內一通來自蘇格蘭，具名畫押者五千餘人。丕斯因向衆力陳鴉片之害，謂：印度倘能別求生財之道，樽節用項，此害去無匪難……諸臣多是其說，獨印度大員哈丁登以有礙印度度支爲解。十七年

（一八九一年）三月，當下議院開門聚議時，大員佐些卑士倡議停給在印度種製罌粟及發售烟土之牌照，院員是其議者一百六十人，非其議者一百三十人。英廷批駁，謂議員動于羣言，是其議者非出本心，當作罷論。又英廷臣語佐些卑士曰：「印度所收鴉片稅，年中數實不貲，今欲禁之，是將革除此稅也，他日入不敷出，勢必另增他稅，華民害去，英民害來，夫豈謀國之道？」蓋至此英之隱衷始揭以示人。」

英國前首相麥唐納 Ramsay Mac Donald，在他的『印度政府（Government of India）』書裏，曾說：「東印度公司犧牲了印度人民的利益以成就牠本身的商業利益。有時，見鴉片存貨很充足，牠命令將罌粟田改種穀物，以期維持鴉片的價格。有時——同樣是作商業上的考慮——牠下令不種穀物而改種罌粟。」從這幾句話裏，可見英國之維護其鴉片貿易政策是無所不用其極了。

德人斯脫伊 Stoye 在其近著『英國與世界』書裏，於追溯鴉片戰爭之下，說道：「這一次是英國殖民史上特別可羞的一頁，爲著這次特別是獎助鴉片的貿易。」在同書裏，他又說：「印度的愛國人士，像中國的愛國人士一樣，曾發生反對鴉片的運動。可是，這對於英國政府是絕不相干的，牠却從鴉片稅裏每年得到將近五萬萬佛郎的收入。所以，牠成立了

鴉片貿易的專利，並將這個毒物飾以『家庭萬應藥』的美名，以期將鴉片的使用推展到廣大羣衆堆裏。』〔見法文譯本 Johannes Stoye: L'Angleterre dans le Monde 第二八八頁〕

總而言之，無論在那一方面，鴉片是英國實現其帝國主義侵略政策之一重要工具，也可以說是包括在英國整個侵略計畫裏面，英人之按步實行這個計畫，決不是偶然的事，也不是隨便可以撒手的事。牠之以鴉片輸入中國，就是擴大實行牠對待印度的狠毒的殖民地政策，也就是林文忠公所說，『早已包存禍心，』『得一步又進一步……爲患無已時』而已。

### 〔二〕英國礮艦政策與鴉片問題

近代帝國主義爲要滿足牠的慾望，第一著自然是占領土地，但遇有不能占領土地的時候，往往用脅迫誘騙種種手段，締結不平等條約，以遂行其經濟侵略。這在近代史上已累試不爽了。究其實，帝國主義所資以活動者，最有效的當然是牠的軍事力量。特別是握有海上霸權的英國，礮艦政策自然是牠最所倚藉的手段。鴉片貿易關係英國利益之鉅，與英人發展其通商地位之努力，既如上述，則英人之以礮艦政策爲其對華經濟侵略的後盾，無疑

序 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了。

認廣東禁煙之役爲「持之過急輕啓戎端」的人們，或許以爲設無此役就不至「生出許多波瀾」，就不至鬧出了陷中國於萬劫不復之地的江寧條約來。他們似乎認爲英國是不輕易放棄其對「天朝」的恭順態度及其和平政策的，他們似乎相信了片斷的記載，以爲英國在此役中是處於被動地位的。

不錯，當納披爾受命來華監督通商事務的時候，英王曾以一八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手諭，誠其所有各種處置應皆取親睦中國的精神，如英國國民之間，或與中國人及其他外人等，有爭論時候，應由監督等妥爲調處開導，務使雙方和平解決。有時或與中國官吏等有所抗議，監督應持和平態度，不得用恐嚇的言辭及求海陸軍保護，但遇非常事變，則不在此限。監督等切不可使中國人民及中國政府猜忌英國，憤怒英國，或疑惑英國有叵測的不陰謀；他們應留意於言語行爲的態度；至於服從中國的法律習慣，他們尤應身體力行。

[Morse: *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* 和稻葉君山清代全史。]

一八三四年一月二十五日，英外相帕馬斯敦 *Palmerston* 以特別訓令誥誡納披爾說：關於裁判事件，非有極重大的事由，不得立即行使勅令所許可的司法權。他又說：監督應服

從中國的規定，不可使一艘英國戰艦駛入虎門水線內，但在非常之時，則不在此限。（同上）。

在一八三八年，當中國人決定斷絕鴉片貿易的時候，「英國政府緘致東方說，假使英國商人自甘以走私的身份從事貿易，則女王（維多尼亞女王）就無以戰船或軍隊保護他們的任務。」（見 William Ewart: Gladstone and his Contemporaries）

根據這些事實，在表面上，似乎英國是極力維持其和平的立場。當然的，英國所想要的自由通商，無非是十足的經濟侵略，尤其是不惜以爲禍無窮的毒物戕害中國——正與牠之戕害印度民族一樣。這個侵略目的設使可以完全達到，牠豈有不相安無事之理？同時，英國的態度是很明顯的：設使中國採取了反抗行爲，就是說，發生了非常的事變，則恐嚇的言辭以至陸海軍的保護，當然是英國貿易的後盾，英國戰艦當然要闖入中國內地，以打開中國重重封鎖的門戶。一言以蔽之，這是整套的帝國主義侵略的程序。

其實，英國之對中國實行礮艦政策，原不是始於虎門禁煙之後。武力以維持通商，以脅迫中國當局，在數年前，早已成爲司空見慣的事件。

若追溯過去久遠時代，我們就已看到英國累次在廣東作武力的嘗試。明末崇禎十年（一六三七年），約翰威特爾 John Weddell 所帶領的艦隊，不待中國通商許可的命令，



便溯虎門水道，強入廣州，砲擊中國的防禦物，直至他們將運來的貨物賣盡及將中國的物產辦齊，才離開廣州。清嘉慶七年〔一八〇二年〕與十三年〔一八〇八年〕，英國軍隊藉口防備法國的攻擊，曾經占領澳門，并曾不顧中國軍隊的阻擋而強航虎門。

到英國派遣納披爾來華之後，武力政策的空氣顯然是十分濃厚了。道光十四年〔一八三四年〕，納披爾要求中國改善通商待遇不遂，因以兵船強航虎門水道，砲擊堡壘，進入商館地域，以威脅中國官吏。

一八三六年，廣東英國商人向英王建議，準備軍隊，以期一旦有事，即可向北方進行。這項建議雖未即為英國政府所採用，但後來鴉片事件發生，英國就完全實行這個辦法。

即在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英國外務大臣發與義律的書簡裏，也說道：『即以我的意見，也以爲欲使通商政策有效，非可以尋常的手段成就之。』在這時候，英國當局決心運用非尋常的手段，顯然已見於字裏行間了。

同時，帕馬斯敦再三再四訓令義律與廣東總督交換通信，無論如何，不可再經公行員之手，并不必採用請願書的形式——這無非表現了破壞中國所設羈勒的行動。義律便緘致英國外務大臣說：『要得到對等的權利，唯有訴諸武力，才能發生效果。他又力陳鴉片事件』